

2025·11·2 星期日

新闻热线 15004520099

哈工大银龄教师鞠春华

跨越5000公里 将爱与知识送到新疆

梁英爽
实习生 林坤 柯晶晶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有这样一群银龄教师,他们跨越山海、重新走上西部讲台,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推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发展。哈工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学退休教师鞠春华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教育者,她跨越5000公里,只为把爱与知识送给新疆的学生。



严格树立“教学标尺”积极融入当地生活

带大四学生写毕业论文时,鞠春华遇到了挑战。有的学生连文献综述都不会查阅,她就一步一步从数据库入口、搜索关键词教起。做实验时,经常有同学出现刻度校不准导致实验数据偏差、记录数据时遗漏单位等问题,鞠春华拿起没校准的量筒说:“今天我们做的是溶液配制,差一点可能只是数据不准,如果将来做药物研发、工程检测,一丝一毫的误差都有可能引发巨大损失。”

鞠春华经常告诉同学们,无论是学习还是将来步入工作岗位,都要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她培养的多名学生毕业后成为教师,将严谨的治学态度传递给更多孩子。“鞠老师批改的作业,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她教会我的不仅

是知识,更是一把标尺,如今我也要把严谨的精神带进课堂。”已经成为中学教师的喀什大学毕业生图尔荪古丽说。

喀什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艰苦:干燥的气候让鞠老师和爱人频繁咳嗽,被子上常年蒙着一层细沙;时差带来的作息紊乱,让习惯早睡早起的她一度难以适应。但最让她动容的,是学生的纯粹与热情。当他们眼睛发亮地说:“老师,这个知识点我终于懂了”,一切都值了。”鞠春华说。

课余时间,鞠春华也积极努力融入当地生活:她经常跟着同事学几句简单的维吾尔语、去巴扎(集市)挑选新鲜的牛羊肉,感受古尔邦节的热闹氛围、去老乡家体验当地风俗。

退休两年后报名援教 用AI让课堂更有趣

2022年,鞠春华在退休两年后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报名参加新疆援教计划。作为在哈工大工作了30年的一线教师,她深知教师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既然有经验,就该去最需要的地方试试。尽管家人担忧环境的艰苦,但鞠老师没有丝毫犹豫:“退休不等于退场,能继续教书就是最好的‘退休计划’。”

初到喀什大学,鞠春华便感受到很大的教学挑战:这里的学生基础比较薄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讲解基础知识,不断调整教学进度。“他们非常渴望知识,每次上课都能被讲台下一双双求知的眼睛打动。”虽然这里的学生活需要更多耐心,但严格的学习标准不能降低。为了讲透一个知识点,鞠春华

经常反复打磨教案直至深夜。

为了让抽象的化学发展史变得生动,鞠春华自学AI技术,将化学知识点用AI技术生成动画,演示化学元素的发现历程,并用数据分析工具拆解化学反应逻辑。“课堂上的鞠老师总像有‘魔法’一样,她熟练操作AI,生成的动画让枯燥的化学发展史更容易理解了。

课下,她总是耐心地为我们拆解化学题里的难点,鬓角的银发上沾了些细碎的粉笔灰,65岁的她依然坚守在教学一线,更加激励着我不断奋进。”喀什大学本科生赵晓婧说。

“老师就该有点创新精神,将教学融入更多新潮流,让学生也能接触到最前沿的教学方式。”鞠春华说。

在哈工大,像鞠春华一样退而不休、重返教学一线、为支援祖国西部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银龄教师还有很多。

“第一次从喀什支教回来后,我忘不了学生那充满渴望的目光。因此,我又申请去喀什继续银龄教师的使命。”这是刘昭教授在退休教职工代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是航天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70多岁的他两度踏上喀什支教之旅,将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倾囊相授。

土木工程学院杨斌副教授说:“年

轻的时候,我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想不到退休之后这个愿望还能实现。”“学校为我们解决了一切后顾之忧,我没有理由不努力。站上讲台就要对学生负责。看到他们的成长进步,我充满了作为教师的自豪感。”建筑与设计学院白小鹏教授说。



2025·11·2 星期日

新闻热线 18604505999

郑智化深圳机场遭遇引共鸣:

莫因公共服务的短板 让我们的生活“连滚带爬”



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

类似郑智化先生在深圳机场的遭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也都可能遇到,只不过当我们身体健全,很多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对一个残障人士来说,我们能够克服的障碍,对于他们可能就是难以逾越的关隘。

这些随时随地影响着我们生活和心情的小破事,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如鲠在喉,所以我非常理解郑智化先生的不吐不快。而我非常不理解的是,有人抓住郑智化吐槽中的那句“连滚带爬”这个形容词不放,拿着来明被剪辑加工过的视频,指责郑智化所言不实,是对现场服务人员的污蔑,让郑智化“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逼得郑智化再次发微博致歉。我不禁想问:这些能够死抠一个字眼不放的人,平时怎么不见他们跟公共服务中的缺失碰瓷?而郑智化的吐槽,才是真正的“星星点灯”,照亮你的前程,因为会为这个社会带来切实的改变。

且不说郑智化这句“连滚带爬”,本身就是借用当下的流行语,而且虽然没有真的滚爬,虽然确有工作人员从旁协助,但郑智化登机过程的艰难狼狈却是事实。如果没有升降机离机门地板那25厘米高度差,又何至于此?

这本是设计之初就该考虑到,也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机场方面却长期视而不见。先制造困难,再提供帮助,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把本应通过系统优化解决的问题,用临时性、个人

化的方式“打补丁”,既未真正考虑使用者的体验,也让人在受助时难以保持尊严。

借郑先生的遭遇,我也想谈谈自己在公共生活空间中经历的几件“小破事”,算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吧。

最近休假,去北方的一个大城市旅游,就住在河边。河岸大道本是城市风景线,我却发现几处堪称“反人性”的设计:一个是一处路段一侧的人行道,走着走着就没了,你只能人车混行,或者折回去一大段路,再回到对面。即使这条路在设计之初有什么难处和不便,至少在断头路面前面过道应该有个提示牌吧?还有更奇葩的,就是我从斑马线走到对面,迎面就是一排水泥花坛把人行道的那一段挡得死死的,连侧身通过的缝隙都没有,还是得人车混行走一段才能上人行道。而这一切要在修建之初,把花坛之间留出空隙就行,我实在不知道当初设计和修建这些花坛的人,究竟有没有用眼、用心去工作?至于共享单车等堵塞人行道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其实这个城市本来很美,也很有底蕴,当地人也非常热情,但就是这些细节的缺失,有如华美长袍上的虱子,大煞风景,令人不适。

还有就是在北京经历的一件“小破事”。北京的公交车都是上下车各刷一次。某次换乘,向对车站极难找,导航也失效。几经周折看到一个站牌,好像显示是我要去的方向,上车刷卡

后司机却告知坐反了,我立刻下车。后来才知正确车站在不远处。等我终于坐上正确车辆,下车时却发现支付宝乘车码被锁定——因上一程未完成二次刷卡,系统判定我“逃票”。客服称需48小时内补登信息。我不解:后台既然能清楚看到我上下车和转车的时间,为何不能自动识别这是误乘?

48小时补登期间若需乘车又该怎么办?司机明知我上错车,为何不提醒再刷一次?这种“宁可错过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设计之初,就只琢磨怎么对付逃票的,却根本没考虑那些可能会上错车又误刷码的乘客。这些看起来都是极小的破事,但却会让人对所在城市败好感,也让自己败心情。不过在我向北京12345反映后,还是得到了车队和乘车码后台公司的积极回应,承认错误并表示会进行整改。这种态度还是值得肯定。

多年前,我就曾在评论中谈到,“城市管理者更要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而能够“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的前提是设身处地。举个例子,有些交警部门出于效率的考量,会将行人绿灯通行的时间缩短,高峰时间尚可理解,但很多时候却成了常态,有时甚至短到行人根本无法一次顺畅通行。有一次我在一条并不宽的路过绿灯,试了几次,都是走到一半就变红了,绿灯时间只有短短的几秒钟,而且没有安全岛。我忍不住给12345打了电话,过了不久有交警打电话回复我说,他们已经进行了整改。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存在很长时间

了,难道这段时间你们就没试着过一下道看看?”电话那边的他瞬间沉默,隔了一会儿说:“我们今后会改进。”其实,这种人为缩短行人绿灯的做法,就是“让弱者退让”逻辑,将行人视为弱者,又默认弱者的时间不值钱,就得为效率让路。至于他们的权利和感受,则似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许多公共管理者仅将设施与服务视为“任务”而非“服务”,要么对上不对下,要么敷衍了事。所以他们只追求设施和服务的表面完成度,却无视使用者的真实体验,让本应便民的公共服务,成了流于形式的“走过场”,甚至是添堵添乱。

如今我们的城市能建起地标性建筑,能搭建复杂的交通网络,却总在这些“小破事”上掉链子,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不要觉得这些小事无关轻重,这就像我们有能力做出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但总避免不了混进几只苍蝇,再精美的菜肴也会让人倒胃口吧?而这正是文明的“木桶效应”:一个社会的整体高度,往往由它最短板所决定,尤其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弱者日常体验的细节。这些细微之处的缺憾和不妥,如同木桶的短板,会不断泄掉我们辛苦积累的宏大成就所承载的人文温度与尊严感。

一个真正体面的社会,应该让包括残障人士等所有人都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而不必在无谓的障碍和缺失中“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可从郑智化在深圳机场遭遇的25厘米来看,想让文明追上发达的脚步,任重道远啊。

物权之外还有伦理责任 岂能为留学逼重病父亲腾房

胡一刀

房产证上写着女儿的名字,但屋内住着患病的父亲与守护的姑姑。面对留学深造的经济压力,女儿一纸诉状将至亲告上法庭,要求卖6岁父母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一边是白纸黑字的物权归属,一边是血浓于水的赡养责任,法院该如何权衡?近日,广东珠海香洲法院公布的一则案例引发广泛关注,法院最终以“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为据,驳回了女儿的诉讼,强调敬老孝亲是“应有的底线”。

应当说,法院这样裁判并不让人意外。首先,公序良俗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女儿为凑留学费用,就让患病的父亲腾房以便卖房变现,这般做法无疑太过冷血、薄情,与传统的孝道以及现代的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其次,从可缓冲的空间来看,女儿尚有其他

替代选择,比如变卖其名下的其他空置房产。与之相反,其父亲若从目前居住的房屋搬出,经济上根本没有余力租房,更遑论女儿所言的另购房产。

作为房产证上登记的产权人,这位女儿主张权利倒也称得上于法有据。不过,案涉房屋的取得,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亲子关系的赠与,具有家庭保障与情感寄托的双重属性。作为被告的父亲自2010年患脑梗后,被评定为二级伤残,生活难以自理,且名下并无其他房产。在这种情况下,若机械适用物权规则,同意其女儿腾房诉求,很可能导致其无家可归,这不仅有违赠与的初衷,也可能构成权利滥用。

进一步来看,这起案件的核心在于家庭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民法典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一义务并

不必讳言,这对父女情感疏离也是导致房产纠纷的重要原因。父母离异后,女儿与父亲聚少离多,这种情感隔阂或许促使其更倾向于将房屋视为纯粹财产,而非承载家庭记忆与责任的载体。而父亲一方,虽曾出资购房,却在病痛与离异的多重打击下,逐渐成为家庭中的“被照顾者”。这场诉讼表面上是房产之争,背后却是家庭纽带断裂后的矛盾爆发。法官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法律的修复,也是对家庭关系的修复尝试——它提醒为人子女者,物权之外,还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

不管如何,“敬老爱幼、互相帮助是应有的底线。”这份判决,不仅守护了一位重病父亲的栖身之所,也守住了社会对家庭伦理的普遍期待。有网友将这位女儿的闹剧概括为“哄堂大笑”,亦表明世道人心坚定站在人伦道德一方。据《南方都市报》